

南风之薰

集解集注里的「慎终追远」

李荣

些体统，说得正式一点，就多少需要节之以礼。这时候，朱子出来说话却正好合适，“丧尽其礼”，用的是慎终的谨戒义，所谓“丧卒有不哀者，不必皆尽礼”，所以要特别地存一点戒慎之心。其实，朱子的话，并不是对于孔安国“尽哀”的话针锋相对地去否定，而是在他的话的基础上加说，既尽辘辘哭泣之情，又慎丧之礼。

再说到追远的祭祀，那当然是不会缺少礼仪和礼节，也就是“礼的形式上的东西”。直到现在来说，一到清明冬至，所谓“扫墓大军”必至，那也是自然的情性使然，正可欣慰。所以，这个时节，礼固然不用担心缺少，但那份追怀的真情却是需要提醒的。朱子便在《集解》“尽敬”的基础上，有所侧重地说了“尽诚”的话，既尽孝敬之意，又致追慕之情也。由此，《尔雅》《说文》里的诚与谨，实在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不是简单的两义相同，也不是两义“相反”，而是“互文见义”也。说到这里，插说一句闲话，即是所谓“尽哀”或曰“诚”，也是各人各有其“诚”。记得西哲加缪小说《局外人》，那位主人公在其母的丧葬之礼上，却是哭不出来。而周围一般世人当然是具“法利赛人眼光”者居多，看见有亲人在至亲的丧葬上不哭泣，都视之为冷漠无人性。其实，那一位主人公对于其母的情感，可谓最深最真最切。这里的诚与谨、谨与诚，便又是别一种意味了。

不过，也不可忘记，在历代集注中，对于“慎终追远”取一广义解释的，也占了相当比例。其实，朱子是广义和狭义都点到了。除了上面所引的那一些，他还说，终者，人之所易忽也，而能慎之；远者，人之所易忘也，而能追之，厚之道也。这便已从“丧葬祭祀”的“狭义”上扩而广之了。皇侃疏亦引《诗·大雅》名句所谓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，曰：终宜慎也。久远之事亲而不忘，是追远也。欣新忘旧，近情之常累；信近负远，义士之所弃。是以慎终如初，则少有败事；平生不忘，则久人敬之也。这也是就其“广义”而言之。

这些“广义”上的道理，在如今的口头日常上还是通用。我们一般人，做事就怕虎头蛇尾，因为按照“人情之常”，往往开头的时候满是“宏图大志”，一心想要大展身手，但是做到后来，最需要耐心和耐得住寂寞的时候，却最是容易松懈，或者干脆寻理由就不做了，甚至不找理由就不了了之者亦是常有。还有一句古话，更是说得深刻，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。到了十之九，终点就在眼前了，却还是达不到的，也不在少数，那个“慎终”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。

至于追远，西谚虽有“健康的遗忘”的说法，但是故人老友相逢，能够共同记住以往生活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细节，相视而笑，那就觉得欣喜。而这些原本的“共同回忆”，最终慢慢变得难有人来“同享”了，却还是同样地对之郑重且珍惜，这里面的情分就更是厚重了。如果再把那个“远”字从久远的时间义向遥远的空间义来引申，那么，即算是在目下眼前、不关己身之切的远方的事理冷暖，却终于还是不忘，系于心怀，这当然是更为难得了。这时候，这种“忘不了”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了不起的情谊和道义。这与上面所说的总括在一起而言之，便是普通自然而然的“人情之常”里面，总有一些缺少的东西，这就需要逆向地补充一点什么进去。

集解集注里的“慎终追远”，多少描画了“集注生态”的一角。这一回的“观感”却是殊不恶也。始知古来“集注生态”，并非如想当然之不堪，各注家往来议论，凡有过或不及处，总会有人出来“补一下”或者“往回拉一下”，把话说得实在一点、在理一点。这便让人又想到一个例子，也在《论语》里，即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这一句。有注家便说，人固有饰巧言令色以悦人而亡心德者，亦有生质之美，言自巧，色自令，而心德亦不亡者。这个话真说得好，否则，生就“欢喜脸”，善言辞、好仪容的人，其“生存压力”也未免太大了吧。

关于这一个“慎”字，《尔雅》释“慎”为诚，而《说文》解“慎”为谨。当然，有论者大而化之，认为诚与谨义同。我们一般人，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大的分别。但是，根据程本《集解》和朱子集注里的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国注和朱子集注里的话，却是分别取“诚”和“谨”来解释这个“慎终”的意思，而又分别以“谨”和“诚”来解释那个“追远”的意思，在两相交错对应当中，把诚与谨之间既“一而二”又“二而一”的那一种关系，挖掘得很有意思。

何晏的《集解》曰：“慎终，丧尽其哀；追远，祭尽其敬。”而朱子的《集注》曰：“丧尽其礼，祭尽其诚。”有后世论者看得仔细，朱子在慎终上“以礼易哀”，取了《说文》的“谨”义，把《集解》用在追远上面的意思移在了慎终上；而在追远的祭祀上，却是“以诚易敬”，把《集解》用在慎终上面的意思移在了追远上了。

按照一般人们的理解和经验上来说，好像《集解》的说法更是合理一点。在亲人的丧葬上，总是哀痛会多一点；而在日后的祭祀上，总是礼的成分要多一点。这是人们的自然的情性。不过，在人们自然的情性上面，有时候却是需要逆向地来“拗”一下子。因为单向总容易过度，双向便可以平衡一点。凡事，顺性而为了自然，所以不用担心其无或者少，却要防多防“溢”，这就需要适当地逆一下性子，顺逆之道，全在乎此。

丧葬上的哀伤也是这样，尽其哀是当然的，不过有时候一些子女亲属却是哭天喊地——作为性情的本来，当然值得同情和理解，但是过度了，“丧”到了昏天黑地，说得俗气一点，是好像少到了

我从小就怀有壮游之志，但限于家庭的经济条件，足迹所涉，不过江浙有限的几个地方。直到1982年考入浙江美院研究生班，两年的学习期间，每年都有足够的考察经费；1986年后又参加了王朔先生主编的《中国美术史》的编撰，获得了更坚实的经费保障。在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每到暑假必有一个多月的外出，挟《中国地图》一册，孤身一人，几乎跑遍了先前所“卧游”过的神州景观。

我的行旅，志在考察人文景观的历史，而与山西的关系最为密切。这一方面缘于山西的地理环境，使历代的人文景观得到了最好的保存；另一方面，更因为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纷呈、跌宕起伏的人文事件，尤其是“春秋”的轰轰烈烈、荡气回肠，大多是演义在三晋这方舞台上的。为此，我还结交了《太原日报》的一批朋友，并长期为他们的副刊写稿，少年意气，文酒相交，极慷慨磊落，仿佛穿越到了热热的“春秋”时代。

大约是三十年前，那一次山西之行的目的地是绵山。到太原与朋友相聚后，第二天便驱车直奔介休，追寻介子推的故事去了。入山，杂木繁茂，溪流屈曲，一洗山下的风尘仆仆、灰头土脸。如果不是森郁的古柏成林，标举着三晋的雄风霸气，真使人宛如置身江南清秀，虽酷暑而不觉炎热。山中有“李姑崖”，传为李世民妹妹的修道处；山巅有“云峰寺”，一坪如砥，峭壁下另有“抱腹岩”，“佛掌痕”。而介子推的遗迹，虽曾在此山中，却踪迹无处寻了。

山上没有一个游人，寺庙也冷落得很，只有我们二三人。薄暮时分，居高临风，四望空阔，在漠漠烟色中凭吊介子推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，眼前渐渐浮现出“刀枪剑戟摆得齐，五色旌旗空中起，人马纷纷绕树迷”的喧嚣，幻化在夕阳的残照下，飞腾起熊熊似火！不由我引吭高唱了一曲马连良先生的《焚绵山》：“春草青青隐翠溪……莫不是来访我介子推？任你搜来任你洗，稳坐绵山永不离！”

世人热衷追逐名利的，也有淡泊并逃避名利的；有为追逐名利而死的，却几乎没有为逃避名利而殉的。严子陵“天下有大有为之君，则必有不召之臣”，便足以留下“万世仰高风”的“山高水长”；为逃避名利而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介子推算得上是千古一人！但“四海同寒食”，后人景仰介子推，只是因为他“士甘焚死不公侯，满眼蓬蒿共一丘”（黄山谷）的鄙弃功名利禄吗？近年重读《春秋》，忆想绵山旧游，对介子推的“高风亮节”又有了新的认识，而颇感千百年来我们对约定成俗的评价，还是不误解的。

“王迹息而诗亡，诗亡而春秋作”，这是《孟子》说的。什么是“王迹”呢？就是周公制定礼乐统治下的西周三百年历史。除立国之初的管蔡之乱、中间的厉王之昏，几乎天下无事。相比于东周以来，重大的事件几乎年年有、月月有、天天有，西周也许是历史上最为平淡乏味的一个时代。或言，这是因为文献记载的缺失所致。但此前的文献记载更为缺失，不也有牧野之战、大禹治水、黄帝战蚩尤、共工触不周的天动地吗？而这正是这个平淡乏味的时代，却被孔子视作“郁郁乎文”的理想社会，各阶层人等正常地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，皆得以安居乐业于风、雅、颂。这就是“诗”。《诗经》三百篇，一言以蔽之曰“思无邪”；《孟子》十四卷，自强不息在“行无事”。“思无邪”则各安本分，“行无事”则各尽本职。那不是教人不要有上进心？不是埋没了人才吗？不是的。因为社会的分工中，“舜以不得禹、皋陶为忧而不忧稼穡，农夫以稼穡为忧而不忧皋陶”，每一个人只要安分尽职，不需要怀才不遇的抱怨，也不需要毛遂自荐的钻营，自有相关的职能部门以发现人才、考察人才、擢用人才为自己的本分本

寒食《春秋》忆旧游

徐建融

职。“诗亡”，并不是说采诗的制度消亡了，采诗的制度一直到“春秋”还保存着；而是指“思无邪”、“行无事”的风俗消亡了，由一部分人并带动许多人，都有了不安分的想法，并付诸不安分的行动，天下从此便纷扰多事了，风起云涌，惊心动魄。折腾的事端虽各有不同，“思有邪”、“行生事”的性质则一。而孔子删《春秋》的目的，正在于“懼乱臣贼子”的邪思生事，庶使天下复归于无邪无事、安分尽职的礼乐初心。

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，《公羊》概括为“大一统，攘夷狄”；《孟子》则说“诛乱臣贼子，治邪说暴行”。后来，常州学派的钱名山先生发挥为“大一统，重人伦，警僭窃，正名分，诛叛逆，外夷狄”（《名山六集·左传论》）。“大一统”所以“尊王室”，“重人伦，警僭窃”所以“思无邪”，“正名分，诛叛逆”所以“行无事”，然后可以“内中国而外诸夏，内诸夏而外夷狄”，天下归心，变非常为正常。

但我们读《春秋》尤其是《左传》，既愤慨于乱臣贼子的倒行逆施，又感动于忠臣烈士的成仁取义。那么，为什么孔子、公羊、孟子们包括钱名山先生删、释《春秋》，只重诛乱贼而不言褒忠义呢？因为，在他们看来，“春秋无义战”，根子便在“思有邪”、“行生事”，包括后世所认可的忠臣烈士，事实上也并非“思无邪”、“行无事”意义上的理想人物。如专诸刺王僚，站在姬光的立场上，专诸固然称得上是一位义士。但姬光之于王僚，实非以正义易不义，而是以不义易不义。这一点，即使当事人之一的季札也是看得很清楚的。

只是，孔子删《春秋》而真使“乱臣贼子惧”的实在少之又少，不惧而变本加厉者则前仆后继。于是，大约从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开始，《春秋》义例，便以诛乱贼、治邪暴与褒忠义、奖贤良并重了，遂使“懼乱

臣贼子”演义为“见善足以戒恶，见恶足以思贤”。但这样一来，也就遮蔽了安分尽职的《春秋》本义。

介子推，正是《春秋》所褒奖并受到后世敬重的人物之一。他与狐偃、先轸等追随重耳，颠沛流离，历尽艰辛，终于复国。在这期间，包括晋文公后来成就了霸业，介子推的事迹并称不上特别的忠臣烈士，而狐偃等更不是什么“乱臣贼子”。那为什么《左传》要褒介子推而贬狐偃等呢？难道真的仅止于对淡泊名利和热爱名利的褒贬吗？显然，《春秋》大义绝不可能是如此的简单，因为它所褒奖的人物中，有不少便是以艰难困苦地成就功名著称的。

原来，追随重耳助其复国，在介子推仅视作自己的本分、本职，“如吃饭睡觉，当然如此”（钱名山先生语）；而在狐偃等，则一个个胸怀图谋、行有目的，视作霸业的博弈。所以，侥幸成功之后，介子推视作“天之功”而“不言禄”，狐偃等则视作“己之力”而争功名；且晋文所赏，在彼而遗此。这就使他“且出怨言”。所怨者，当不在自己的“禄弗及”，也不在狐偃等的得享高官厚禄，而在“思无邪”、“行无事”的风俗沦丧，而“思有邪”、“行生事”的风气大炽，“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”。介子推的悲剧，不正是“王迹息而诗亡”的一个具体例证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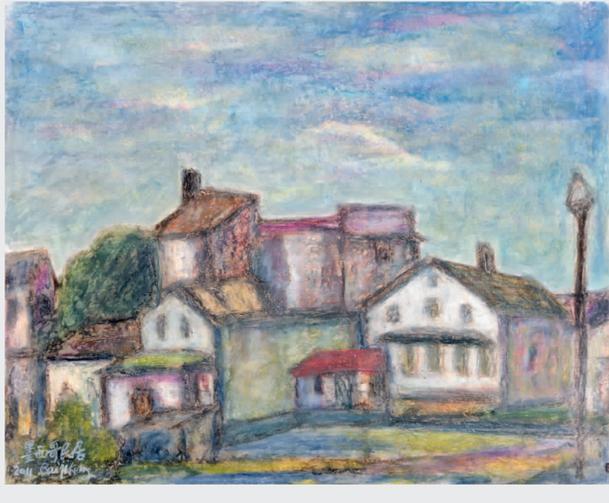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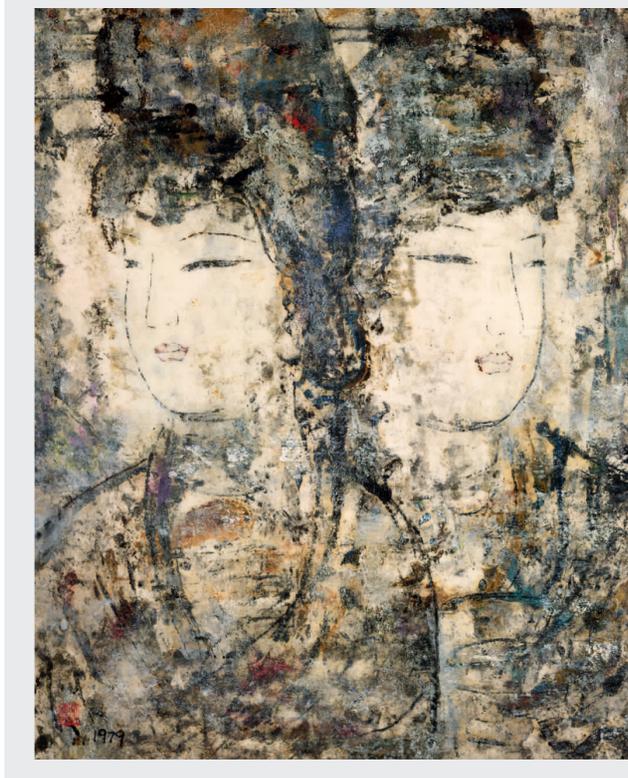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平凡的人物，坚守着一颗平常的日之心同时也是礼乐之心，在“春秋作而霸业兴”的背景下，就这样引发了一场风风火火的历史大事件，并因此产生了中华民族一个重要民俗节日，与后来屈原的端午节火水灌，并垂千秋。但屈原之死，高扬的是英雄主义的忠义精神，而介子推之死，伤逝的只是日常生活的无邪无事。所以，后世的人们过端午节，没有不怀念屈原的高风亮节的；而过寒食节、清明节，又有几人联想到介子推无邪无事、安分尽职的《春秋》大义呢？至于历代的诗人，多有借寒食节作怀才不遇感叹的，实在是离题愈远了。

近年，山西的朋友时有相邀，说是介休县正以“介子推就住在这里”为题，大力打造旅游胜地；今日的绵山，也远非三十年前的景象了。我却以种种原因，“树犹如此”，无暇再作旧地重游，乃以小诗一首为寄：

寒食春秋忆旧游，
风云龙虎斗思仇；
心无邪思行无事，
天下归仁乐九州。

笔会

左：供养人
(纸上油画，1979年)
下：墨西哥民居
(固体油画，2011年)
孔柏基 绘



再会，孔柏基先生

陈燮君

收拾，力透纸背，滋润渗化，情思悠悠，尽收神奇，难以复制，不可多得。

孔先生的画有鲜明的艺术个性。“向往自然，崇敬自然”为其一。他深信“自然的召唤”，对自然有亲切之感、深切之悟。他说：我乐于肩背着画夹，在康州格林威治小镇附近奔逐，寻觅景色，写生作画，置身于春天的妩媚，夏天的葱茏，秋天的艳丽，以及冬天的静谧。细品行云流水，一树一屋，让我沉浸其中。于是我的画风，显得比以浸重了许多。我只是想画出大自然的纯洁和深邃，让我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种融化其中的心境。

大自然中的树干百态，孔先生说他画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树，对树确实情有独钟。他说：看树画树，常如痴如醉。树绝不类同，极具个性；不

卑不亢，极具自尊；铜铸玉琢，极有格调；挺拔轩昂，极有品性。树色千万，四季各异，明暗互映，交错相衬，起伏呼应。因为我热爱大自然，深感最伟大、最纯洁、最仁慈、最浩瀚、最崇高、最永恒的，只有大自然。我和女儿陈颖，曾多年与孔先生一起到大自然中写生。记得2012年早春二月，在美国东海岸的海湾写生，我们都冻得直哆嗦，孔先生却挺直腰板，从容作画，至今历历在目。孔先生的绘画作品《海边》《花》等都是写生作品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仰和热爱。

“画敦煌，追远风”为其二。经过长期的艺术准备，孔先生于1979年和1982年两次赴敦煌，足迹遍布莫高窟、榆林窟和西千佛洞，两次都见到了常书鸿先生夫妇，在那里画的作品“数以百计”，回来后悉心定稿

仅是他自己的发现与表达，也不仅是中西艺术在形式上融合的实践方式，而且是提示了中西艺术在本质精神上相接近的可能性……时过境迁，当年的许多“前沿”命题而今成为常识，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艺术史会记下孔柏基先生的历史性贡献。

“记忆亲情，怀念生命”为其三。孔先生的许多作品抒写了“记忆亲情，怀念生命”这一永恒的话题。他画故乡，画小时候常常见的槐树和后院。孔先生每天早上起床，梳洗完毕，整理衣着后，总要站立在母亲相片前思念母亲。孔先生还常常梦见姑苏，梦见故乡。他在《伟大的梦》一文的尾声动情地写道：“不管如何，这总是我的梦，我无法忘却，无法回避，无法鄙弃。我的梦也许告诫我，应当怀念历史、怀念故乡、怀念曾经引领过我的人；应当缅怀梦的启示，从生命中去珍惜梦的抚爱。”孔先生的深深的亲情、乡恋和感恩，使他进一步理解生命、走近历史、感恩亲情，使他的艺术创作不断走向成熟，趋于经典。于是，《路口》描绘了孔先生和鄞鄞丽老师初来美国时每天接送上班的时空，借景抒情，迸发出紫灰、玫瑰色的基调；有了《童年回忆》和《墨西哥民居》的乡恋情结、人文缅怀……